

·“当代科学哲学发展趋势”笔谈·

科学哲学的文化研究转向

郑晓松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上海 200235)

科学哲学的发展,除了自身内部的逻辑张力外,还受到外部的两个“大环境”的影响:一是科学,特别是重大科学理论发展的状况,比如,20世纪上半叶的物理学革命对当时的科学哲学的发展就产生了重大影响;二是哲学主流的走向,科学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关系密切,可以说,科学哲学是在作为更大背景的西方哲学中发展的,后者的每一次重大理论发展都会对前者产生深远的影响。比如,随着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兴起及盛行,后现代科学哲学亦成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态势。实际上,西方科学哲学也一直存在着两个相应的发展主流:一是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这一分支更多地出现在英美学术圈中,很多研究者身兼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双重身份,这主要是因为英美更重经验和实证性的文化传统。二是以欧洲大陆为主的更侧重于哲学的研究模式,主要是以哲学的思维方式反思科学的本质,建构科学哲学的范式及理论体系等等。当今西方科学哲学研究依然呈现这两种主要发展态势并存的局面。不过,前者似乎声音较小,影响不大,后者则愈来愈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20世纪的科学哲学,历经了从逻辑经验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历史主义,到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历史发展轨迹,当今科学哲学的发展又处在一个新的关节点,这就是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反思和研究科学及技术。

科学哲学的文化研究转向,顺应了当今哲学的发展趋势。从意识哲学到语言哲学再到文化哲学,这是西方哲学发展的基本走向。意识哲学始于笛卡尔的基础主义,笛卡尔认为,自我是惟一绝对确实的东西,他通过绝对怀疑的“自我”确立了“我是、我存在”和“我思、我在”这两个哲学的基本命题,由此引出意识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以“心里的观念”为出发点,构造起主客对立的二元世界。意识哲学之后,语言学转向在英美传统和大陆学派中相应发生了,语言被确立为当代西方哲学的“阿基米德”点,这其中又经历了从语文学到语用学的转变,由此“语言游戏”、“生活世界”等范畴被引入到哲学之中。语言是整个文化的基础,文化在语言中显现自身。任何人都是文化世界的居民,自我与对象、主体、客体都居于同一世界中。一切活动都决定于当时、当地的文化环境,无法逃脱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讲不同语言的人,其生活方式与习俗各不相同,因而处于不同的文化传统之中。当今语言哲学研究中的语用学转向更是表明:语言的

意义只存在于人的言语行动之中,一切意义都是人的意义,都是文化的意义。因此,语言学转向所涉及的实质是文化哲学的问题。文化哲学要求信念定型和经验意义的整体主义观点,主张回到日常实践的生活世界,确立语用学为新的语言观,强调不同的社会文化和不同的“意义场”之间的相互关联,研究别人的文化传统必然会卷入被研究的文化传统之中,要在两者之间进行对话,以便不至于曲解另一种文化,理解了别文化才有可能对自己的文化作出恰当的评价。

当代西方哲学的文化哲学转向对科学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已经涉及到科学研究中的文化哲学的问题,而时下的科学知识社会学更是把文化问题特别地彰显出来。从一定意义上讲,波普就经历了从意识哲学到文化哲学的范式转变:早期以《科学发现的逻辑》为代表,主要体现为意识哲学,到了后期提出“三个世界”理论时,他已经基本放弃了意识哲学,而接近于文化哲学。

西方科学哲学所呈现出的文化研究的转向,主要基于对科学本质的深层次哲学和文化的沉思。其实,对科学,特别是对科学的基础作人文的反思由来已久。维科首先确立了一种文化的观念,并从文化学的角度反思人类的思想、情感和世界观等各类行为以及肉体上、精神上 and 情绪上的多种反应,他还区分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表明两者的本质差异。休谟由“休谟问题”理悟到,任何科学实质上都是关于人性的知识,离开了对人的认识,没有这个人文基础,科学的大厦也就无从建起,为此他提出了关于人性的科学,以便给科学的基础进行“人文论辩”。康德通过纯粹的哲学反思对人类的理性进行划界和批判,阐明先天知性范畴如何普遍必然地和经验对象联系在一起,同时又具有客观有效性,从而把科学纳入到人及人性的框架之中。

尽管如此,早期的科学哲学特别是逻辑经验主义却完全把现实的人排斥在科学研究活动之外,在逻辑经验主义那里,对自然的认识主体实质上是科学家群体所体现的具有绝对性的抽象主体,单个的、社会历史的人在科学的视域中不存在,因而科学知识是客观的,是通过逻辑推理出来的并可接受没有什么个人色彩的纯粹经验的检验,科学史也就是科学的内在逻辑的必然运动。但是,人,归根结底是社会的存在,人性也是在社会中形成的,因此,科学与人及人性的本质关联必然会通过社会层面表现出来,这样一来,科学的人文

基础也必须依赖于社会这个境域才能得以开启,于是,经过历史主义对逻辑经验主义的带有社会学和文化色彩的强力批判,科学知识社会学进入了科学哲学的语境。尽管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有着本质的不同,两者的研究对象、思考方式以及所采取的范畴、概念等也大相径庭,但这两类知识也有其相通之处,自然科学如同人文科学,是作为主体的人的知识,毕竟是以人为中心凭借其智慧创造出来的,因而自然科学的知识基础亦关联着人文意蕴,也具有社会向度,“有关自然界的知识,跟社会知识一样,依赖于问题的类型,而这些问题是依据认识者的目的及其社会观点而提出来的。”^[1]由此观之,科学知识社会学不仅揭示出科学活动与活动主体——作为社会现实存在的科学家之间密切相关,而且把科学知识本身也建基于社会和文化之上,就是说,关于自然界的科学知识作为某个研究共同体的结论,一方面取决于自然界自身的规律,另一方面它像文化产品一样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在对自然作出解释时必然受到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的影响,因而科学知识也是一种文化知识。

科学知识社会学已经开启了科学哲学的文化研究的序幕,从人类文化学这一更深层、更具普遍意义的视域来研究科学,可以使更深刻透彻地理解科学的本质。科学作为人对于自然的一种理性认识活动,是人类独有的文化现象,正是科学与人的这种本质关联,铸成了科学的文化本性。在西方,科学通过启蒙运动上升到文化层面。启蒙运动以科学作为对抗王权和宗教的利器,以之开启人性,从而赋予科学以文化的内涵和本性,启蒙运动之后,科学成为西方文化发

展史的主向度。今天,科学的文化本性和内涵在于它已经成为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文化基础。B·巴恩斯指出:“科学并非首先是提供特殊的技能,而是要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文化和思想基础。”^[2]C·斯诺亦表明:“科学文化确实是一种文化,不仅是智力意义上的文化,也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共同的态度、共同的行为标准和模式、共同的方法和设想,这些相同之处往往令人吃惊地深刻而广泛,贯穿于任何其他精神模式之中,诸如宗教、政治或阶级模式。”^[3]科学的文化本性在于它作为人的生活和行为方式的基础,因而归根结底融入了人的文化本质也即“人性”。动物的本质是由天生的确定的本能规定的,人的本质即“人性”则是在社会和文化的视阈中建构起来的,是在生活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历史构成的。各种人类活动在历史的展开中,上升到文化层面便融入人性之中。科学作为人类活动正是上升到文化层面而成为人性的规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科学进行文化学的研究已经成为当代科学哲学的一个最重要的发展走向。

【参 考 文 献】

- [1] 马尔凯·迈克尔. 科学与知识社会学[M]. 林聚任等译. 上海: 东方出版社, 2001. 21.
- [2] 巴恩斯·巴里. 局外人看科学[M]. 鲁旭东译. 上海: 东方出版社, 2001. 22.
- [3] C·斯诺. 两种文化[M]. 纪树立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4. 9.

科学哲学: 对科学的人文理解

朱凤青

(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一 科学哲学的产生

科学哲学的产生是自然科学和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20世纪初,科学理论加速度出现和发展,特别是经典物理学的崩溃和新的物理学的发展,非欧几何系统的建立,几何、代数、算数的公理化,命题逻辑的符号化等。这种根本性的变革自然地唤起人们对科学进行元研究。另有一些哲学家要用科学改造传统哲学。赖辛巴哈在《科学哲学的兴起》一书中指出:“本书认为,哲学思辨是一种过渡阶段的产物,发生在哲学问题被提出,但还不具备逻辑手段来解答它们的时候。它认为,一种对哲学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不仅现在在,而且一直就有。本书想指出,从这个基础上已经出现了一种科学哲学,这种哲学在我们的时代的科学里已经找到了工具去解决那些在早先只是猜测对象的问题。简言之,写作本书的目的是要指出,哲学已从思辨进展而为科学

了。”^[1]新哲学的出路只能是使其变为像科学那样实证,或以实证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改造哲学,把哲学从凌驾于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变成从属于科学的“关于科学的哲学”或“科学性的哲学”。

逻辑实证主义提出用“科学的逻辑”代替传统的哲学概念。他们预设理论谓词(陈述)和观察谓词(陈述)之间的区别,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严格区分,希望把理论内容还原为观察资料或感觉经验,由感觉证据推出自然界的真理,按照逻辑-数学措辞与方式界定真理。科学理论被看作是“得到部分解释的形式演算”、是组织观察的有用工具,除了暗含的观察内容外别无其他的任何意义。

卡尔纳普把语言的职能分为“表述”和“表达”两种基本职能。语言的“表述”职能是对经验事实的陈述,语言的“表达”职能只是对人的情感意愿等等的表达,这类命题既无法验证也无所谓真伪,因而是“无意义”的“假问题”。因而把形